

第一章

杜威的大学时代和教授生涯

从 1859 年 10 月 20 日在佛蒙特州的柏林顿出生，到 1952 年 6 月 1 日在纽约去世，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

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杜威是在自己的家乡受完中小学教育的。他喜爱读书，几乎对阅读任何书籍都感兴趣，但对采取死记硬背方法的传统学校教育却感到厌烦。可以说，在杜威所受到的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课堂外面获得的。因此，杜威的女儿简·杜威在《杜威传》一书中指出：“在形成约翰·杜威的教育理论的各种因素中，他童年时代的环境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虽然简·杜威这段话不无道理，但是当我们解读杜威的漫长人生和他的学术道路时，不难看出，在杜威探索现代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在他学术上走向成熟和完成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构建的整个过程中，他的大学时代和教授生涯显然起着更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佛蒙特大学起，杜威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确立了研究哲学的志向。这是杜威的大学时代的第一阶段。对杜威来说，这是他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起点，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当

然，这要归功于以哲学为传统的佛蒙特大学的学术环境，更要归功于他的老师特别是托里教授（H. A. P. Torrey）的指导和鼓励。

告别家乡以及佛蒙特大学，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杜威的大学时代的第二阶段。然而，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阶段。因为在美国第一所研究性大学中，杜威受到了更浓厚的学术气氛的熏陶，接触了更多的发挥激励作用的人，参加了更广泛的学术活动和研究，从而更加坚定了研究哲学的志向。特别是莫里斯（G. S. Morris）教授，对杜威的成长影响和帮助最大。

在大学时代结束后，杜威开始了他的大学教授生涯。他先后在密执安、芝加哥和哥伦比亚等大学任教。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在学术上逐步走向成熟，不仅表现在哲学上，而且表现在教育上。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从美国走向世界，不仅成为美国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成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在密执安大学，杜威不仅在承担教学工作的同时继续哲学的研究，而且开始对教育产生兴趣。这促使杜威萌发了把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想法，从而使他有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到芝加哥大学后，杜威在哲学上提出了工具主义理论，在心理学上创立了机能主义心理学派。与此同时，他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教育实验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构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显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杜威不仅确立了他在美国哲学界的地位，而且开始确立他在美国教育界的地位。

哥伦比亚大学是杜威的大学教授生涯中任教时间最长的一所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期，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教育上，杜威都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特别是1916年《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出版，无疑确立了杜威在美国教育界的地位，他被誉为美国最有创建和最渊博的教育家。更重要的是，杜威在这一时期开始由美

国走向世界，成为一位具有最广泛和最深刻影响的世界教育家。

正如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教授贝里（T. Berry）所指出的：在杜威的漫长一生中，“从 19 世纪 80 年代的初期起，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0 年的门徒身份，10 年的摆脱影响和崭露头角，其后 50 年杜威成了杜威。”^①

一、杜威的大学时代

杜威的大学时代是在佛蒙特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度过的。在佛蒙特大学，杜威决定把哲学研究作为一种志向；而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他开始表现出作为一位学者和教师的潜力。

对于杜威来说，无论佛蒙特大学还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都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学术环境。尤其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为美国第一所研究性大学，是一个进行创造性研究和获得真才实学的高等学府。杜威的成长显然得益于这样的大学。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在佛蒙特大学还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杜威都遇到一批很好的教师。特别是佛蒙特大学的托里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莫里斯教授，对杜威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杜威自己后来也这样说：“总的说来，影响我思想的一些力量，来自于人和环境超过了来自于书本。”^②

当然，作为杜威本人来说，在从佛蒙特大学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整个大学时代，他开始确立并一直坚定自己的学术信念。虽然他个性比较内向，但是，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在杜威的一生中，从柏林顿走向巴尔的摩无疑是重要的一步。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现代美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362 页。

杜威著：《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载《杜威传》，第 66 页。

（一）杜威与佛蒙特大学

佛蒙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创建于 1791 年，设在佛蒙特州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柏林顿。它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第五所最古老的学院，排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和达特默思学院之后。这所大学以它在哲学方面的传统而骄傲。

当时美国大学的规模是小的，佛蒙特大学也不例外。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这所大学每年入学的学生人数约九十多人，而教师仅有八人，都是旧式学院的教授。

在佛蒙特大学里，所有的课程都是必修的。前两个学年，开设希腊文、拉丁文、古代史、解析几何、微积分等课程；第三学年的课程以自然科学为主，其中包括动物学、生物学、生理学等；最后一学年的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国际法、文化史、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哲学、逻辑学等，旨在给学生介绍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世界，使他们在大学前三年里已经建立的学术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在建立于 1865 年的州农工学院与佛蒙特大学合并后，又增加了农业和工艺课程。

早在马奇（J. March）教授担任佛蒙特大学校长（1826～1833）期间，该校就受到了其他学院的关注。同时，马奇作为一位哲学教授，又是最早研究和讲授德国哲学思想的美国人，表现出一种冒险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佛蒙特大学的教师都坚信自由思考是人的神圣权利，因而鼓励学生去思考并形成自己的思想；他们还认为，学生的个性在大学里也应该得到很好的发展。一位学生在回忆古德里奇（J. E. Goodrich）教授时曾这样指出：尽管他讲授的课程是古典文学，但“他的讲授充满了敏锐的‘探究’、问题和建议，激励个人去思考”。①

引自戴克休曾著：《约翰·杜威的生平与精神》，1973 年英文版，第 10 页。

由于在教室里一般是每位教师教 15 个学生，从而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接触更为频繁，促进了他们的思想交流，从而给学生更大的影响。直到很多年以后，即 1939 年，杜威在佛蒙特大学作讲演时仍提到：这些教师都是他们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学者；与这些教师的接触能对人起激励作用。

柏林顿的几乎所有中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佛蒙特大学。1875 年，还不到 16 岁的杜威也与哥哥戴维斯·杜威（Davis R. Dewey）一起成为杜威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这时，佛蒙特大学校长已由巴克姆（M. H. Buckham）教授担任。

应该说，大学里的课程，仅仅部分地满足了杜威的兴趣和爱好。对于他来说，自然科学课程是新的和有趣的。尤其是生理学课程使用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 H. Huxley）的课本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起了杜威对事物的一种广泛的学术好奇心，并使得他这个年轻人对哲学学习产生了兴趣”。^①对此，杜威自己也曾这样写道：“要精确地讲出这么多年前我在学业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困难的；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即从这门课程中学习到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统一观念。……总之，从这种学习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刺激，比我从以前的任何学习中得到的刺激都多。虽然没有什么原因促使我继续学习那门特别的学科，但从这个时候起，我被唤起了对哲学的特有兴趣。”^②

当然，杜威最感谢的是在佛蒙特大学里最后一年的教育。因为这一年的学习标志着杜威一生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他决定把哲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

对杜威作出这样的决定起重要作用的是那些在他大学最后一学习期间讲课的教师。例如，校长巴克姆教授开设了政治经济学、

简·杜威著：《杜威传》第 10 页。

杜威著：《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载《杜威传》，第 57 页。

国际法、文化史等课程。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既具有条理和有逻辑性的思维能力，也具有清楚的表达能力。他是一个确实具有说服力的人，但反对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的教学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①在课堂上，巴克姆教授特别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和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也经常离开规定的课程去讨论当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无疑对杜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又如，开设心理学和哲学课程的托里教授对杜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巴克姆校长曾这样评论托里：“我不能不说，他曾是一个笛卡儿主义者，或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或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或是一个洛采主义者；但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成熟的哲学家。”^②托里教授认为，应该鼓励学生在教学中提出问题和克服困难；教学的目的并不是给学生传递一个体系，而是激励和引导他们去进行探究。杜威在《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一文中也这样写道：“佛蒙特大学教授托里先生是个真正有见识和有教养的人，对美学具有明显的兴趣和爱好。……他对哲学的兴趣是真诚的，不是草率的；托里是位优秀的教师，我的成长应该归功于他对我的双倍恩惠。他使我的思想明确地转向了把哲学研究作为终生的职业，并在那一年用了大量时间对我进行指导。在托里教授的个别指导下，我开始专心于哲学史方面经典著作的阅读，并学习富有哲理性的德国哲学著作。”^③

当时的哲学课程包括政治和社会哲学以及智力和道德哲学两个方面。杜威的兴趣更多的在政治和社会哲学，但是，智力和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他也有吸引力，杜威从佛蒙特大学毕业后马

简·杜威著：《杜威传》第11～12页。

引自戴克休曾著：《约翰·杜威的生平与精神》，第16页。

杜威著：《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载《杜威传》，第58页。

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是有关形而上学以及智力和道德哲学的。

此外，对杜威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是他阅读了当时正在广泛流传的书籍和期刊。杜威回忆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什么书都读的人。在大学图书馆和城市图书馆里，无论什么书籍和期刊，凡是感到有兴趣的和有用的他都阅读。因此，杜威的学习成绩有一段时间也受到了影响。当时，佛蒙特大学图书馆订阅的那些英国期刊主要论述以进化论为中心的新思想。其中有《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十九世纪》（*Nineteenth Century*）、《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等。这些期刊定期发行，刊载了大量关于经济、政治、社会、道德、宗教和哲学问题的文章。例如，通过在《双周评论》上刊载的英国法学家哈里森（F. Harrison）的一些文章，杜威扩大了他的哲学读物的范围，并把注意力转向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 Comte）。毫无疑问，“反映了新酵素的英国期刊，是约翰·杜威这一时期在学术上的主要刺激物。这些英国期刊对于他的影响，比他所学的系统的哲学课程更为深刻。”^①

在自己的学术兴趣方向确定之后，杜威更多地阅读一些哲学家的著作，更深地研究一些哲学家的理论。阅读孔德、哈里森等人的著作，使得杜威对社会环境与科学和哲学思想发展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独特的兴趣，以至他曾把公共演讲的题目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准备讲述孔德对政治经济学从属于社会学的影响。同时，由于托里教授的影响，激起了杜威对康德（I. Kant）和德国哲学思想的兴趣。1883年11月17日，杜威在写给托里教授的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要感谢你的帮助，因为在我开始学习时你给我介绍了康德。我想，我对哲学已有了更好的了解，超过我用其他任何方法所了解的。……它必定会给我的全部思想引入一个彻底的变革，

简·杜威著：《杜威传》第11页。

同时为我的其他阅读和思考提供了一个基础。”^①

在大学前三学年里，杜威的各门课程的平均成绩为 83.5 分。但由于对第四学年的课程特别有兴趣，他的平均成绩提高为 92.35 分，在同一班毕业的 18 位学生中名列第二。在佛蒙特大学的四年学习中，杜威不仅从听课和阅读中获得了知识，而且提高了有逻辑地和精确地表达思想的能力。在大学二年级时，杜威参加了一个地区性的大学生联谊会（Delta Psi）；到毕业时，他成为了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Phi Beta Kappa）的一个会员。

1879 年夏天从佛蒙特大学毕业后，杜威曾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的一所中学和佛蒙特州夏洛特的一所乡村学校担任教师。但是，杜威继续保持着对哲学的兴趣，他的业余时间大多用来阅读哲学书籍。特别是在佛蒙特州夏洛特的乡村学校任教期间，杜威有了更多的机会在阅读哲学名著上受到托里教授的指导，直接聆听托里教授在课堂上没有讲过的观点和见解。正是在托里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杜威在美国教育家和哲学家哈里斯（W. T. Harris）主办的《思辨哲学杂志》（*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1882 年 4 月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文章，题为《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The Metaphysical Assumption of Materialism*），在当时美国惟一的和有特色的哲学刊物上，杜威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见解。

佛蒙特大学是杜威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和把哲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生涯的起点。在杜威的一生中，他深深地怀念故乡柏林顿和促使他在学术上起步的佛蒙特大学。1939 年 5 月 1 日，杜威曾应邀回到佛蒙特大学作年度演讲。10 年之后，即 1949 年 10 月 26 日，杜威夫妇又一起回到柏林顿，参加佛蒙特大学举行的杜威 90 岁生日庆祝会，这一切都勾起了杜威对在佛蒙特大学学习生活的回忆。第二天，杜威在给佛蒙特大学代理校长莱曼（E. Lyman）教授的信

引自戴克休曾著：《约翰·杜威的生平与精神》，第 15～16 页。

中深情地写道：“这次返校是那样的温暖和真诚，确实超出我事前的想像。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场合能比得上你们昨天的晚宴。我真希望，我知道如何向你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①但是，这是杜威在他的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柏林顿，回到母校佛蒙特大学。

（二）杜威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882年秋天，在托里教授和哈里斯博士的鼓励下，杜威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杜威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他开始追求新的目标。显然，这一行动也表明了杜威与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环境的告别。

1. 美国第一所研究性大学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创建于美国独立 100 周年的 1876 年。它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中心，离商业区仅几条街。根据美国商人、银行家和慈善家霍普金斯 (J. Hopkins) 的遗嘱，他所捐赠的 700 万美元的遗产的一半将用于建立一所大学，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所大学遵循德国柏林大学的新精神，模仿德国大学的办学模式，整个学校重点始终放在研究生教育上，因而成为美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

为了创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董事会当时邀请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 (C. W. Eliot)、康奈尔大学校长怀特 (A. D. White) 和密执安大学校长安吉尔 (J. B. Angell) 一起商议。在物色这所大学的校长时，他们一致推荐了吉尔曼 (D. C. Gilman)。吉尔曼 1853 年从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曾赴欧洲国家考察教育，其间有一段时间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855 年回国后他任教于耶鲁大学，曾参与创办谢菲尔德理学院。1872~1875 年，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在正式接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

长后，吉尔曼又专门赴德国大学进行了考察。

从办成一所研究性大学的目标出发，吉尔曼在办学指导原则上吸收了德国大学尤其是柏林大学的精神，使得这所新的大学环境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首先，吉尔曼认为，大学是一个自由的科学研究场所，教授必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把教学与创造性研究结合起来。他强调说：“学术研究是每个教授的职责，而且教授应该是学生的指导者或激励者。”^①其次，吉尔曼认为，大学成为一个优秀的高等学府的关键是拥有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高水平的一流学者。他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一所大学的声誉应当体现在它的教师和学者的水平上，而不是体现在教师的数量和所使用的建筑物上。”^②第三，吉尔曼认为，大学应该经常鼓励学生去了解创造性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他明确说：“对大多数年轻学生来说，一旦有了一种创新的和令人振奋的思想，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和有创造性的研究。学生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的人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他们从前所受过的教育从来没有使他们想到，他们自己可以成为这种幸福的人。”^③第四，吉尔曼认为，大学必须改变原来旧的教学方法，采用德国大学所发明的研究班（seminar）方法，注重实验室和图书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每年督促研究生报告研究成果并给予发表出版的机会。因此，在美国大学中前所未闻的研究班，却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术生活的中心。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876 年 9 月 12 日举行了开办典礼。吉尔曼校长作了充满智慧和坦率的就职演说，承认约翰斯·霍普金斯

^① 引自布鲁巴克、鲁迪著：《变迁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学院和大学史，1636～1976》，1976 年英文版，第 179 页。

引自赫胥黎著，单中惠等译：《科学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9 页。

引自简·杜威著：《杜威传》第 17 页。

大学从其他大学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并强调了对学术研究工作的激励。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也应邀在开办典礼上作了关于大学教育的讲演。在讲演中，赫胥黎强调指出：“世界的未来掌握在那些对于自然的解释能够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的人手里。大学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发现这些人，爱护这些人，并培养他们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自己事业的能力。”^①他还充分肯定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激励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所采取的措施，认为在这里将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得到提供给他们教学，而且教学将包括人类所有的智力活动范围。最后，赫胥黎祝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声誉与日俱增，成为一个能获得真才实学的学府，一个自由研究的中心，一个智慧之光的聚合点”。^②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方当局不惜花费财力从国内外聘请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形成了以一流学者为主的师资队伍。其中，在数学方面有西尔韦斯特（J. J. Sylvester）教授，在物理学方面有罗兰（H. A. Rowland）教授，在化学方面有雷姆森（I. Remsen）教授，在生物学方面有马丁（N. Martin）教授，在希腊文方面有吉尔德斯利夫（B. L. Gildersleeve）教授，在历史学方面有亚当斯（H. B. Adams）教授，在心理学方面有霍尔（G. S. Hall）教授，在哲学方面有皮尔斯（C. S. Peirce）教授以及从密执安大学来任教的莫里斯教授，等等。这些教授不仅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而且都是具有丰硕研究成果的学者。在教学中，除了讲课和实验的方法，教授们主要采用研究班方法，共同讨论，相互启迪，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刚开办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规模很小，其学生都经过严格筛选。美国教育学者瑞安（W. C. Ryan）指出：“看一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名单，就能预言：这些人在随后的三

^② 赫胥黎著：《科学与教育》第167、171页。

四十年里将成为美国大学的著名教授”。^①

在吉尔曼校长的支持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学术团体，例如，哲学学会、政治学学会、科学学会等。同时，又创办了学术刊物，例如，数学杂志（1876）、化学杂志（1877）、语言学杂志（1880）、生物学杂志（1881）等。更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还成立了一个出版机构，以便在学生中和向大学外传播知识。

在学校管理上，吉尔曼校长排除教会影响或党派偏见。对于教授的学术研究工作，他不惜财力给以充分的保障。此外，吉尔曼校长还经常分别会见学生，友好地鼓励他们并向他们提出建议。

总之，在吉尔曼校长的领导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上。从1876年创建到19世纪80年代末，仅仅十多年时间，这所大学培养的博士总数已超过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两校之和。^②许多学生都感到，能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是极大的幸福。

确实，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培养了美国许多著名学者和重要人物。除杜威外，还有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W. Wilson），以及哲学家罗伊斯（J. Royce）、历史学家特纳（F. J. Turner）、作家佩奇（W. H. Page）、社会学家斯莫尔（A. W. Small）、经济学家康芒斯（J. R. Commons）、心理学家卡特尔（J. M. Cattell）等。因此，在1902年吉尔曼因退休而辞去校长职务的典礼上，曾是这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威尔逊说：“你是第一个美国大学的创始者，你发现真理，提倡研究，不但是在我们学校有成绩，给世界大学也有影响。”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也说：“你创立了研究院的

^① 瑞安著：《早期研究生教育的研究》，1939年英文版，第32页。

参见布鲁巴克等著：《变迁中的高等教育：美国学院和大学史，1636~1976》，第181页。

大学，并且坚决提高了全国各大学的学术研究，甚至连我们的哈佛研究院也受了你的影响……。我要强调指出，大学在你领导之下是成功的，是提倡科学研究的开始……”^①

2. 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学习生活

杜威听从托里教授的建议决定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托里教授曾于 1882 年 2 月 11 日写推荐信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的莫里斯教授，希望能给杜威提供研究员基金。同年 8 月 11 日，杜威本人也给吉尔曼校长写信，表达了想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迫切愿望：“我非常渴望继续我在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学习，尽管很可能得不到研究员基金，但仍十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奖学金名额，因为那将使我在下一学年里继续我的学习。”^②

尽管托里的推荐和杜威本人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是，杜威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决心并没有动摇。于是，1882 年 9 月，他向一位亲戚借了 500 美元动身去巴尔的摩，进入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杜威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正是因为它的重点在研究生教育上，并已获得很好的声誉。

当杜威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那一年，毕业生人数是 125 人；第二年增加为 150 人。虽然这所大学开办已有 6 年时间，但学校规模仍很小。而且，班级规模也很小，尤其是在哲学系，班级学生人数最多只有 11 人。这使得教授和学生之间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便于相互交流思想和见解。

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后，杜威发现这所大学的学术气氛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从而更加坚定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信念。后来，

引自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64 页。

引自戴克休曾著：《约翰·杜威的生平与精神》，第 27 页。

杜威在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曾这样说：“无论什么事情都比不上在巴尔的摩对学生的冲击，因为那里的活动和奋斗的环境是智力的。那里没有智力的懒散，也没有死气沉沉。学生既没有被当做接受讲课内容的水桶，也没有被当做为了把教科书内容作为每天的谷物磨碎的碾磨机，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发现去探求真理，教师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就是适当的鼓励和建议。”^①

杜威主修哲学，同时又把历史和政治科学作为他的副修专业，其中有：“公共机构史”“英国史”“比较宪法史”“美国公共机构”“美国家政”“国际法”等课程。尽管校长吉尔曼曾建议杜威转到其他的学术领域去，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杜威采纳。

在哲学系里，杜威听了皮尔斯的逻辑学课程、霍尔的心理学课程、莫里斯的哲学课程等。正如杜威的女儿简·杜威所指出的，与霍尔教授和莫里斯教授的交往，特别是与莫里斯教授的交往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霍尔的心理学课程使杜威了解了心理学方面新的趋势。作为美国心理学最有影响的先驱者之一，霍尔于 1881 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他不仅开设了生理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两门课程，而且还为那些去从事教学工作的学生开设了“科学教育学”研究班。杜威听了霍尔开设的所有课程，并在心理实验室里进行了一些独立的实验。

莫里斯的哲学课程是杜威最满意的。作为密执安大学的教授，莫里斯从 1878 年起每学年有部分时间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来任教。杜威参加了莫里斯开设的研究班，第一学年是有关“知识科学”“不列颠哲学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第二学年是有关“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德国哲学史”。莫里斯的讲课颇有个性，有力量

引自戴克休曾著：《约翰·杜威的生平与精神》，第 29 页。

参见简·杜威著：《杜威传》第 19 页。

地和真诚地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因而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 1882 年 10 月 5 日给托里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莫里斯教授关于不列颠哲学史的讲课具有批判的特点，而不是描述的……”^①直到 1915 年杜威在《对乔治·西尔韦斯特·莫里斯的评价》(George Sylvester Morris: An Estimate)一文中还写道：“我对莫里斯教授的主要印象是：作为一位教师，他是一个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人，在表达思想时充满着激情。这一印象在许多年以后仍旧是十分清晰的。”^②

在莫里斯的影响下，杜威对黑格尔(G. W. F. Hegel)哲学产生了兴趣。杜威的女儿简·杜威曾指出莫里斯的个人影响是黑格尔哲学之所以对杜威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毫无疑问，他的老师莫里斯那异常的、容易感受的纯洁，以及热情洋溢和专心致志的个性对此起了作用……”^③尽管杜威后来渐渐地离开了黑格尔主义，但他在《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从来没有想忽视，更不要说去否定，与黑格尔的结识在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痕迹。……在他的思想内容中，常常有一种使人惊奇的深度；在他的许多分析中，除去机械的和辩证的装饰之外，还有一种非凡的敏锐性。如果我可能成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信徒的话，我将仍然相信，在黑格尔那里比在其他任何一个有体系的哲学家那里有着更多的财富和更加多样化的见识。”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期间，莫里斯无疑是对杜威影响最大的一位教师，也是对杜威帮助最大的一位教师。杜威从莫里斯的教学精神中吸取了养料，受到了很深的感染。后来，杜威指出：“我十分乐意地承认，他的教学精神对我有着持久的影响。对一位

引自戴克休普著：《约翰·杜威的生平与精神》第 32 页。

博伊兹顿主编：《约翰·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 10 卷，1991 年英文版，第 110 页。

简·杜威著：《杜威传》第 20 页。

杜威著：《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载《杜威传》，第 64～65 页。

易受影响的和不了解适合于他心灵的某个思想体系的年轻学生来说，他不可能不深深地受到莫里斯那热情和博学的献身精神的影响，或者说至少使他在观点上发生一种暂时的变化。”^①与此同时，莫里斯在一些方面给了杜威具体的帮助。例如，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第一学期结束后，莫里斯推荐他去教大学本科生第二学期的哲学史课程。尽管每周两次课，学生仅仅只有七人，但是，承担本科生教学工作使得原来仅仅在写作方面有自信心的杜威在教学方面也增强了自信心。这也是杜威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在哲学方面所教的第一门课程。又如，为了使杜威能在第二学年获得研究员基金，莫里斯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虽然吉尔曼校长是在向佛蒙特大学校长巴克姆和托里教授进一步了解杜威个人情况后同意给杜威提供研究员基金的，但莫里斯的推荐还是起了作用的。这样，杜威就能够在承担本科生教学的同时继续博士生的学习，而不会因此增加自己的债务；而且，由于杜威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收入，他也能更加集中精力于他的学术研究。总之，“从各方面来看，与莫里斯的交往，对杜威的成长是有极大好处的。”^②

虽然杜威性格沉默寡言，但他仍参加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形而上学俱乐部（The Metaphysical Club）的活动。形而上学俱乐部是这所大学的系俱乐部之一，成立于1879年，由皮尔斯、莫里斯和霍尔等教授轮流担任主席。参加形而上学俱乐部活动的，既有教师，也有学生。形而上学俱乐部每月一次会议，讨论由俱乐部成员提供的关于哲学以及有关问题的文章。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一些文章，曾在形而上学俱乐部会议上宣读。例如，1882年12月12日，他向形而上学俱乐部提交了题为《认知和感觉的相对性》（Knowledge and Relativity of Feeling）的

杜威著：《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载《杜威传》，第62页。

② 简·杜威著：《杜威传》，第21～22页。

文章。又如，1883年4月1日，他在形而上学俱乐部会议上宣读了题为《黑格尔与范畴理论》（Hegel and Theory of Categories）的文章。形而上学俱乐部的活动一直继续到1884年，正好是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一年。

与当时美国的其他大学不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没有诸如联谊会、周末舞会一类的活动。但是，它提供一个房间用作社会中心，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在课余时间都可以汇集在那里相互交流、讨论和娱乐。后来，杜威曾回忆道：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不知道美国学院的那些有特色的传统和习惯。如果要问哪里是学院的中心，人们就会指向俱乐部的一间小房间，教师和学生在那里会面，喝着德国的啤酒，唱着德国歌曲。学院的中心就在那里，既在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①在他看来，这种方式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对学生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的亲密朋友有：来自康涅狄格州后来担任波多黎各总督的耶格尔（A. Yager）、美国物理学家金布尔（A. L. Kimball）、美国大学生物学教授奥斯本（H. Osborn）、美国生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李（Frédéricks S. Lee）、美国心理学家贾斯特罗（J. Jastrow）以及卡特尔等。杜威的女儿简·杜威指出：“这样的交往，对杜威在教室里和……图书馆中所得到的教育来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补充。”^②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充满学术气氛的校园环境里，再加上哲学系教授特别是莫里斯教授的指导，作为一个研究生的杜威在学习期间（1883～1884）就在杂志上发装了三篇文章，其中包括：《认知和感觉的相对性》《康德和哲学方法》（Kant and Philosophic Method）、《新的心理学》（The New Psychology）。正是在约翰斯·

引自戴克休曾著：《约翰·杜威的生平与精神》，第41页。

简·杜威著：《杜威传》第18页。